

精神引领与意识形态的较量

——意识形态理论视野下的知识分子特质探析

石晓岩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知识分子是精神世界的引领者,批判性是他们的精神本质,他们习惯独立于体制之外,对意识形态所做的欺骗进行抨击和嘲讽。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是统治者巩固政权所利用的意识工具,而列宁将意识形态调和成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作为精神引领者的知识分子在遭遇教化公民政治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理应作出精神引领者还是意识形态维护者的选择。

关键词 知识分子 精神引领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9)01-0035-04

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是统治者巩固政权所利用的意识工具。这一意识工具在被统治者的观念中种下了种子,使被统治者成为听话的奴仆或者说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公民,并将意识贯之于行动。而知识分子天生就是顽固不化的流浪者,他们善于思辨,具有较高的理性修养,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引领者。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让他们在面对现实领域的问题时能够不畏强权,所谓权威在他们看来都是值得批判的。作为精神引领者的知识分子遇到了教化公民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知识分子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意识形态宰制了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建设了意识形态,这需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分别加以追溯。

一、作为精神引领者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卡尔·曼海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知识分子作过一个经典的界定: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漂流的群体,而非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诉求的阶级或阶层^[1]。知识分子的基本特性就是其“无根性”,他们疏离于各阶层之外。而这种疏离使得知识分子能够超越于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局部利益,从更为理性的层面上达到普遍的、公正的判断。正如萨义德所秉持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表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相对于社会主流思想而言,知识分子是“局外人”、“业余者”、“搅动现状的人”。他们不为利益或奖赏所

动,有一种摆脱了特定利益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始终是分离于政治之外的一种精神世界的权力,在精神世界里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引领政治权力行使其职能。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必须积极参与政治,关注社会,更多地运用其知识的优势来思考公共问题,并且能够超越一己私利和阶级局限,理性地、公正地对待问题的判断和理解。坚持真理,不为任何权势与利益所动容,这是知识分子所承载的精神实质所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普遍认同。成为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积极投身于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中,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起艰巨的社会责任,在捍卫真理、启发民智上勇敢地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勇于承担,不回避问题,也是知识分子精神实质的一种重要体现。知识分子作为尽职的个体,暴露谎言,说出真理,永远是其最根本的责任。“知识分子有特别的责任要向权势者发言,因为权势必须向社会公民负责,尤其当这些权势被运用于不道德的战争或用于歧视、压迫和集体残暴的蓄意计划中时^[2]。这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一个麦田上的守望者,一群漂流于人群之上引领人们精神世界的流浪者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自觉性。

1. 独立性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保证其批判视角和理论导引实践功能正确发挥的基础,包括其独特的视角,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权力,对社会变革和文化走

收稿日期 2008-09-22

基金项目 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84/408255)

作者简介 石晓岩(1984—),女,黑龙江大庆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向的强有力的影响,对大众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而其有意识地保护独立性体现在其立场的中立性、独立的价值观、学院化的生存方式、独立话语体系、学科制度化、知识和思想独特体系和专业化的传承渠道、领导舆论思潮的自觉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度的责任感等等,这使其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精神领域的统治阶层、精神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并在人类文明的精神成分越来越重的大趋势中越来越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3]。知识分子是通过精神领域中的探险和向导作用赢得自己在人类文明进入自觉创造的独特地位的,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精英层次、白领阶层、精神生产者和导向者形成了理性和精神的权威阶层,知识分子通过其独立的生存方式、大学研究机构、文化生产和管理的部门、大众传播系统等等都为知识分子独立的生存方式提供基地,与作为统治阶层的附属的角色相比,拥有更广泛的自由和尊严。

2. 自觉性

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关注的主动性,对公共道德的批判和遵守的自愿性,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知识分子对理性的思考和不盲从大众与政治导向的观点,并能够引导大众认识真理。知识分子是有着强烈社会干预意识和自觉服务意识的群体,他们的自觉性是一种对自身和社会的自省与自察。正如孔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必然的是知识分子,除非他讨论到一般重要性的问题,如战争、贫穷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必然的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执导的东西不单纯地为感官娱乐而触及较深刻的社会文化问题。余英时先生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维护者”,并进而指出一个掌握了某种知识技能的人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4]”。王晓明先生在他的《追问录》中谈道:“我总以为,人类社会所以产生知识分子,就因为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种狭隘的功利关系,依照整个人类生存的需要来设计社会的蓝图。……我们所以把一个人看作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有这一点理智的信仰,靠着头脑中那尊思维之神的鼓励,他能够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中站稳脚跟,不为所动,但在那般识时务的聪明人看来,他正是一个不合时的迂夫子^[5]”。知识分子当然首先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个人,是一个关心他个人所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是社会的眼睛与良心。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精神使得知识分子能够自觉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从而推动合

理社会的形成。

知识分子作为精神引领者的同时必须与政治有关,因为关切社会、关心底层人的生活、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是知识分子精神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政治的介入使得知识分子在理性与意识形态之间遇到了岔路口,对于知识分子本身这一复杂群体的界定出现了两难,是政治权力统治的工具,还是社会、政治的精神引领者,是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意识形态棋子,还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驯化了统治者的政治权力?

二、对“意识形态”的追溯

1. 意识形态概念的诞生

“意识形态”一词原本产生于西方社会,为法国的托拉西所引入西方哲学史。意识形态的法文词: *idéologie* 是由 *idéo-* 加上 *-logie* 构成的。*idéo-* 的希腊语词源是“理念”或“观念”; *-logie* 的希腊语词源是“逻各斯”,即“学说”。所以,对于托拉西说来, *idéologie* 就是“观念学”的意思。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理论。在这之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就指出错误的观念来源于社会的原因,这一所谓的社会原因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而对非统治者观念进行“欺骗”,即对被统治者的观念教化。而意识形态一词在托拉西那里刚刚产生时是一种肯定性的概念,在他的论著中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观念学的概念发展起来的。观念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的程度。就像齐格姆·鲍曼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的伪科学,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只能是意识形态^[6]”。同时,托拉西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时间的意义,因为它也是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的基础。所有这些学科如果不能还原为感觉就必然是虚妄的,就不属于意识形态^[7]。

2.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然而意识形态在其出生不久就遭到了非议,拿破仑在恢复帝制的道路上受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阻挠,于是开始反对和迫害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倡导者,指责意识形态家们是空想主义者,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彻底的、简单化的感觉主义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无法作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然而“历史的幽默和讽刺在于,以反传统的谬误的观念为根本宗旨的意识形态概念一开始就步入了误区^[8]”。而这或许是马克思后来批判意识形态概念的原因。马克思最初称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还论述了以下的问题:①“虚假的意识”;②“以社会为条件的意识”;③在意识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观念或“精神”,而是物质的关系(社会秩序、社会地

位等等)⁷¹。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意识形态具有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史观,是虚幻的信仰体系,即由虚幻的思想观念或虚幻的意识构成;二是作为思想的上层建筑,是政治运动的思想动力,是带有某一阶级或集团鲜明特征的信仰体系;三是产生意义和形成思想的普遍过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层建筑的层面来理解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观念体系,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一个范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9]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这样的目的,即统治阶级的权力。新阶级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消除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容易的。马克思在探索共产主义世界的理论和实践中,向往无阶级的社会,而将意识形态归结为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理论发展的必需。

马克思指出在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必将终结。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这一语词所代表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预见到了,随着阶级社会的终结,在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也必将终结。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需要用普遍利益的幻想来掩盖相互之间不一致的特殊的利益,因为把“特殊利益”扮作普遍利益或把“普遍利益”扮作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再是必要的了。到那时,观念也不再被想象为“统治的”观念,而自觉的和联合起来的人们将以非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方式组织起共同的生活并创造他们的产品。^{[8] 26}

3.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而列宁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之上发展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他认为,意识形态确实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没有超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10] 209}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又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它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的阐述,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正如拉雷所说:“对于列宁说来,意识形态成了关系到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治意识,他特别把探讨的重点放在资产阶级的意

识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上。因此,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含义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的概念。^{[8] 205}这里所谓的中性概念就是说,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同的阶级都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将马克思思想理论拉出了自己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却批判意识形态的峡谷^[11]。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层或政党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而采取的政治手段的指导思想,并且使这种思想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诉求和政治信仰,成为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获取往往来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以及对政治的批判。而当一种理念骄傲地成为了政治理念甚至政治信仰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就下降到了政治层面,成为一股新的意识形态力量。

三、精神引领抑或意识形态—— 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例

知识分子与政治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争鸣,到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的哲学探讨,再到今天寻求对真正知识分子的价值界定,知识分子总是在政治之内引领意识形态,为统治者做宣传的华美外衣;或者于政治之外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追求真理和理性的根本价值,并为整个社会作精神引领。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时候,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对于理性正义和劳苦大众的立场,来批判特定历史时期的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可是,为马克思所没有想到的是,历史的车轮很快转向了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真正幸福要在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和建设中获得,然而,当无产者获得政权,打着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之于意识形态,到底是精神引领,还是被意识形态所宰制?在此,我们谨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一斑,来窥探当精神引领者遇到成为统治精神的意识形态的时候,知识分子所找寻的道路何在?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形态中,相当比例的“士”被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吸引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构建和阐释中来。“道”这一精神传统,引领了中国千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在圣人的指引下,人们知道了何谓伦理纲常。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高于皇权,与专制权力相抗争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视道为至上法则,道的权威高于权势,即世间之王的权威。然而,这一“道统”的最终理想不仅是孔子,而且

是几乎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终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的转变,士人的最终目标达到了,即参与构建、阐释意识形态。这些士人成了位于“政治中心”的知识精英,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阶层”。

历史进程表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文化得到了皇家的重用。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儒士比先前的士人更加得志。然而,儒学在被皇权宣布独尊的同时,也就被置于皇权之下了,即把儒家的这一思想文化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儒术成为政治原则的同时,也成了统治的工具和官方的意识形态。“儒术变为君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似乎获得了显赫的地位,令人尊崇,但是儒学丧失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品格。由政治规范对思想文化的强行介入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政治权利宰制理性的必然结果,清人方苞说过:‘独尊儒术后;儒之途(仕途)通,其道亡矣。’^{[12]109}。“学依附于政治,就要遵照君主政治的要求和规则思维去行事。政治体制一旦定型,便容不得他人置喙,学术只好做了王权的鼓吹手^{[12]114}。当学术下降到政治,就已然成为了政治权力所宰制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无法摆脱为统治阶级书写意识形态的最终命运,而那些无法成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就如创造它们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随着历史的洪流被湮没进了遗忘的尘埃中去了。”士人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权由于有政治权力为后盾,可以借助政治干预的力量,所以它实际上形成了葛兰西所说的相对于政治统治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使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成为有别于‘政治统治阶级’的‘社会支配阶级’,从而决定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比较而言,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人充当‘意识形态家’的角色,而传统中国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属于意识形态阶层,因为他们的政治文化工作之一就是构建并阐释意识形态^[13]。

知识分子精神中的独立性很难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出来,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中从来就没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分过家,他们对于价值信仰的重建打上了深深的工具色彩,缺乏价值理性的支撑。由于太过功利主义的价值选择,知识分子为了国家、民族,在理性与意识形态的选择上造成了混乱,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为学术而学术,为理性而思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可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做到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这个联系与西方所诉求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的精神传统刚好相反,如萨义德所倡导的知识分子批判精

神:“吸引我的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而不是一种调适的精神^[14]。”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作为精神引领者的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之间较量的结果,但是真正的精神引领应该是并不受控于任何政治权威。精神引领与意识形态之间其实是在不可调和之中寻求一种妥协,知识分子下降到政治领域为统治阶层塑造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的形成本身也为知识分子解决了承载自身理性载体的生存问题。正如哲学与政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产生了政治哲学一样,哲学家的精神世界永远漂浮于云端之上,必定是曲高和寡,耐不住寂寞回到地面之上,发现政治的世界另有一片可以为哲学家高声吟唱的精神世界,只不过这个吟唱变了味道,任何的价值判断都没办法彻底说服相互结合的双方。无论是“反对”也好;“调适”也罢,精神引领者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我们都无法做出输赢的评判,而这一较量在人们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之前都无法结束。

参考文献:

- [1]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鸣, 李书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58.
- [2] 于琦.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及其当代意义[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19.
- [3] 杨岚.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独特社会功能的发挥[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1(4): 106-108.
- [4]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
- [5] 王晓明. 追问录[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44.
- [6] 齐格蒙·鲍曼. 立法者与阐释者: 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 洪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34.
- [7] 转引自田科瑞. 意识形态概念新探[J]. 理论与改革, 2004(2): 149-152.
- [8]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2.
- [10] 列宁. 列宁选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26.
- [11] 张俊梅.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探析[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0(1): 26-29.
- [12] 葛荃. 权力宰制理性: 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13] 刘晔. 迈向现代国家: 知识分子与现代国家建设[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2.
- [14] 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35.